

第一辑

现代中国与世界

主编 张剑 江文君

主 编

张 剑 江文君

编辑部主任

马 军 蒋宝麟

编 委

杨国强 罗苏文 安克强

甘慧杰 白华山 陈 磊

段 炼 张晓东 赵 婧

主 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

《现代中国与世界》发刊词

张 剑

丝虫病由奴隶从西非带到西印度群岛并引起疫情,病患逐年增多,但华人移民患病率一直很低,一般以为这是种族因素造成的。这一说法因语言不通等原因无法得到证实。1921年,一位就学于伦敦热带医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的中国年青人,访问了英属圭亚那首都乔治敦近半华人,通过血液化验和对生活习性的调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华人并没有对丝虫病的种族免疫性,他们患病率低是因为他们日落而息、使用蚊帐的卫生习惯和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丝虫病这一热带疾病对所有的人种都有同样的危害性,并没有种族免疫性,无疑是热带病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发现。

这个年青人就是1894年出生于江苏武进的李宗恩,1911年留学苏格兰,从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伦敦热带医学院继续研读,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就职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创中国的热带医学研究,并在抗战期间创建贵阳医学院,战后出任协和医学院院长,1948年以“裂体虫病、线虫病、疟病、回归热等研究,曾主持贵阳医学院”当选首届中研院院士。李宗恩研读的伦敦热带医学院由“热带病之父”万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创设于1899年。万巴德是苏格兰阿伯丁人,18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应聘到台湾打狗(今高雄)担任海关医官。1871年调厦门,接触到大量中国病人,碰到天花、疟疾、登革热、霍乱等疫病,也遭遇到引起热带医学革命性进展的象皮病。通过不断的实验和研究,他确认按蚊是人类丝虫的中间宿主,历史上首次发现昆虫是人类寄生虫疾病传播的一环,由此热带疾病研究转向昆虫。万巴德后来到香港开业

当医生,曾为李鸿章治病,招师弟康德黎(James Cantlie, 1851—1926)为助手,担任香港华人西医书院首任院长,孙中山为首届学生。1889年,万巴德回国,加入疟疾研究潮流,并任职殖民部,利用资源创立了伦敦热带医学院(1923年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改名为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导英国驻印度医官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 1857—1932),成功地找到了引起疟疾的疟原虫。罗斯因这一成果获得1902年诺贝尔奖。

热带医学的开启与发展,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英国、中国、印度因这一科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纽带,中国海关、英国殖民部、康德黎、李鸿章、孙中山因万巴德而连接起来。当然,热带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结果,英国的万巴德,中国的李宗恩、协和医学院,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因之而联系在一起。

自科学革命以来,特别是随着技术革新的快速发展,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外来因素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自然也愈来愈重要,其他国家的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中国发展的“蝴蝶效应”。因此,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应该扩展视野,以世界眼光观照现代中国的发展,寻找现代中国发展动因的内在和外在因素,探求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更好地了解与理解现代中国的发展。

职是之故,我们特创刊《现代中国与世界》,汇聚学界新声,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科发展,主要聚焦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侧重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关联,根据论文论题设地方与社会、文化与政治、中外关系、革命与战争、抗战研究、国际汉学、文献目录、治学经验谈、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栏目。本刊为连续性刊物,每年一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热诚欢迎海内外广大学者赐稿。

2017年10月

目 录

发刊词	1
地方与社会	1
近代江苏地区性社会形态差异臆说 / 马俊亚	1
上海公共租界边界铁门的形成(1927—1929) / 马 军	30
万众一心：自由职业团体与近代上海的民族主义实践 (1927—1941) / 江文君	45
抗战与外交	63
雷君彦与《日寇祸松日记》 / 张 宇 段 炼	63
国民政府的汽车动员与上海八一三抗战 / 李云波	77
美国视野下的 1942—1943 年宋美龄访美 / 宋时娟	96
美援外交与国内政治：抗战时期中美易货借款新探 / 曹嘉涵	114
日本视野下的中国货币制度改革问题探析 / 朱佩禧	138
抗战时期的中间地带 ——以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皖北地区的活动为例 / 康武刚	146
文化与政治	158
The Novel as “Revolution” — Relations of Themes and Contexts in Huang Shizhong’s Historical Writing / Liu Xunqia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58

1930 年代：海派绘画的形成和发展 / 陈 晔	180
中国科学社的消亡与不绝的回响 / 张 剑	193
曾纪泽的英语学习 / 梁 艳	234
 治学经验谈	248
我是如何进入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 ——川岛真教授访谈录 / 戴海斌 采访整理	248
 读史札记	277
她才是第一个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 马 军 撰译	277
 研究综述	281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研究述评 / 韩洪泉	281
 会议追踪	299
“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蒋宝麟	299
 史料集成	313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因应山海关事变的部分函件 魏晓锴 译, 黄化 校对, 李玉 审订	313
1933 年 5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往来函 魏晓锴 译, 黄化 校对, 李玉 审订	320
美国传教士费奇指控日军洗劫其南京、上海财产并请求赔偿的 一组函件 / 王静 译, 李玉 校	325
 征稿启示	338

近代江苏地区性社会形态差异臆说

马俊亚

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历来是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关注的现实问题与学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对社会发展的一般形态和规律作了科学的阐述。1912和1916年,列宁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分别把中国论述为“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近代社会阶层作了系统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认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掀起了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专门和相关论著约700种,重要论点可见钟离蒙等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战》^①、陈翰笙等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②、周子东等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③。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均主张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何干之、吴黎平等在论战中捍卫了这一史观。^④近年来,李洪岩等学者厘清了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⑤陶希圣、严灵峰等人主张近代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

① 钟离蒙等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战》(第13—14册),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1984年。

② 陈翰笙等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卷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③ 周子东等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

④ 何干之:《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新思潮》1930年第5期。

⑤ 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点。^①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魏特夫通过对中国生产力水平和政治制度的考察,阐述了中国封建专制的特征。^② 日本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相关研究,并与中国学者展开争论。^③ 魏特夫的著作对日本学者具有相当的影响,日本学者常把对水患的控制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客观基础,强调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在于绝对的皇权专制。^④ 田边胜正对包括永佃制在内的中国土地制度研究尤详,^⑤仁井田陞注重从法律角度探讨中国的社会形态。^⑥

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仍然受到学者的关注,专门和相关论著不下数千种,其中对“封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结构”的探索尤为深入,李埏、胡如雷、傅衣凌、瞿林东、冯天瑜、吴承明、李根蟠、王先明、黄敏兰等各种新见迭出。^⑦ 还有学者把中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反事实”特例;^⑧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不同民族从蒙昧向文明生活转变的形式相差很大,不存在统一规律。^⑨

本文不再把出租土地、收取租金作为封建形态的唯一标准,而是按照马

①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岳麓书社,2010 年;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动力》1930 年第 1 卷第 2 期。

② K. A.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C. L. Hirschfeld, 1931.

③ 柏佑贤:《アジア农业の特质》,《东方学报》第 25 册,1954 年 11 月;辰己经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论争的诸成果及残余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月刊》1935 年第 3 卷第 10 期;晴山见鸟《最近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发展》,《时事类编》1935 年 3 卷 21 期。

④ 清水盛光:《支那社会の研究》,岩波书店,1939 年;清水盛光《中国乡村の治水灌溉に現はれたる通力合作の形成》,《东方学报》总第 18 册,1950 年 2 月;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亜纪书房,1974 年;森田明《清代の水利と地域社会》,中国书店,2002 年。

⑤ 田边胜正:《支那土地制度研究》,日本评论社,1942 年。

⑥ 仁井田陞:《中国の伝統と革命——仁井田陞集》,平凡社东洋文库,1974。

⑦ 李埏:《论我国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历史研究》1956 年第 8 期;冯天瑜《“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傅衣凌《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历史研究》1982 年第 5 期;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 1979 年;黄敏兰《中西封建社会结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0 期;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王先明《关于近代中国半封建问题的辨析》,《河北学刊》2009 年第 4 期。

⑧ Mark Elvin, “China as a Counterfactual”, in Jean Baechler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⑨ Lawrence Krad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Netherlands: Van Gorcum & Comp. B. V-Assen, 1975.

克思的论述,把人身强制和人身依附作为封建关系的核心依据,以此厘清近代江苏地区外表不同的封建形态。

一、江南: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江南^①地区在明清至 1949 年盛行永佃制。《吴县志》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吴农佃人之田者,十八九皆所谓租田,然非若古之所谓租及他处之所谓租也。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祇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有时购田建公署,架民屋,而田价必田主与佃农两议而瓜分之,至少亦十分作四六也。又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②20 世纪 30 年代初,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证实,江南永佃制下,“地主仅为田底之所有者,佃户则拥有田面之所有权”。^③1950 年,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对松江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土地仍有“田面”权与“田底”权之分,田面权就是永佃权,“即农民对土地有长期的使用权”;^④地主将田面权卖给农民,须写绝卖契(名“春花永状”,又称“杜绝契”),表明田主不能再从农民手中拿回使用权。^⑤

永佃制下的主佃关系消除了人身依附,由较单纯的市场关系支配。据费孝通调查,田底占有者拥有土地所有权,负担土地税,但无权直接使用土地进行耕种。仅占有田面,不占有田底的人被称为佃户。佃户保留田面权,不受田底占有者的干涉,佃户的唯一责任是交租。由于土地(即田底)市场的交易自由,“地主及其土地之间的个人关系缩减到最小的程度”。大多数田底拥有者对于土地的位置、耕作、甚至对于佃户都一无所知。他们的唯一兴趣就是租金本身。^⑥

① 这里的“江南”系指雍正二年行政区划时的松江、苏州、常州三府及太仓直隶州范围。

② 曹允源纂:《吴县志》卷 44,民国 22 年铅印本,第 37 页 a—b。

③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 2 编,民光印刷公司,1933 年,第 36 页。

④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 年内刊本,第 144 页。

⑤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45 页。

⑥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26、131—132 页。

可见,江南农村,尽管存在着佃户,但他们拥有较多的自由权利,不需要承担其他封建义务,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与最基本的特征。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步转化为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史。”^①显然,江南土地租佃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农村的封建性得以消解。

江南的田底拥有者并不仅仅是地主,资本家、甚至工人阶级皆拥有田底,并用于出租。

1882年,上海宝源祥公司在外虹口购地百余亩,以零租金的代价让乡民耕种。^② 20世纪20年代初,在吴淞地区,“沪上工商各界前往购买地亩者颇不乏人”。赵鸿藻、朱葆三、张济澜、童立善等资本家,有的购地二三百亩,有的则达一二千亩。^③ 上海老顺记铁厂在镇海置田3000余亩,可炽铁号在宁波有田地200余亩、在上海近郊有田数十亩。^④ 汪敬虞先生列举了多例江南资本家占地情况,其数量均在数百亩以上,有的多达数万亩。^⑤

近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无锡,绝大部分资本家占有土地。庆丰棉纺集团唐保谦与“丝业大王”薛寿萱家族各占地6000余亩,五金业翘楚周舜卿占地约3000亩。^⑥ 中小资本家同样占有土地。松江县新农乡四个村田底权业主中,地主兼工商业者46户,出租田底546.68亩。^⑦ 无锡杨北乡济南等7个小村的20户中小资本家有地158亩多,无锡南门铁业公司占有土地三四十亩,茂兴公司40多亩,启新纱厂30余亩,华新纱厂有桑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6页。

② 《限期让地》,《申报》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85年1月6日),第3版。

③ 《淞市政处对私团圈地之主张》,《申报》1922年10月15日,第13版。

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⑤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019—1023页。

⑥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1020—1021页;中共苏南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内刊本,第483页;江苏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第一集《第四区》,江苏省农民银行总行,1931年,第77页。

⑦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42页。

200余亩,这些土地直到土改时仍租给农民耕种。土改调查称:“无锡为苏南主要工业城市,工商家在四郊占有土地为数颇多。”^①源椿铁号在无锡有田百余亩。其余王大有、锦和、森昌等厂主在农村各置地几十亩不等。^②1949年前后,江南工商业资本家,户均占地12.51亩,超过了江南7.65亩的户均占地数。^③昆山工商界占地总数35298亩。^④

过去,学界多把资本家占有土地等同于封建性:“中国资本家大多是由封建地主、官僚、商人等转化而来的……他们的软弱性因此可说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他们创办工业后,仍然继续大量兼并土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⑤这种看法并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实情。

即使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英国,资产阶级也被视为具有“软弱性”,与中国截然不同,英国资产阶级这种软弱性不是与封建地主阶级有联系,而是与地主阶级强硬政治立场相对立而显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固守以国家荣誉为骄傲的政治传统,为了战争,他们毫不吝惜地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他们比较富有,对民众的负担难以感同身受;而且,他们的财富不是来自贸易,与那些贸易受到威胁、财产就会受损的资产阶级不同,因而,“他们身上没有那种政治软弱性,即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⑥相反,害怕战争、害怕贸易受损的资产阶级则处处示弱。

在中国近代反帝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并不软弱。如在五卅运动中,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富裕阶层在罢工罢市后,有着充分的积蓄而保证生活不受影响,因而反帝立场强硬;恰恰是底层的码头工人,一日不作,则全家饥寒,从而不得不在夜间偷偷复工,向外商妥协。^⑦

①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2年内刊本,第166—168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③ 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内刊本,第768—769页。

④ 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502页。

⑤ 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0页。

⑥ [美]马汉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⑦ 马俊亚:《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史学月刊》2003年1期,第95—101页。

就经营策略而言,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家投资土地,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原料基地。即以时人及后来学者们批评最剧、认为其占地达数百万亩的张謇来说,^①张謇经营的盐垦公司,首先改良了大量苏北沿海原来不适合农业耕种的盐碱地。据调查,中国自棉花传入后,“不注意改良,听其退化……厂家所受之间接影响,正复无穷”。^②民国初期,两淮有荒地1400万亩。^③张謇几乎凭一己之力,集资创办农业公司,使盐碱地成为中国近代最重要产业棉纺织业的原料生产基地。1930年,盐区棉田4602654亩,产棉447820担(每担160市斤);1934年,棉田达5196000亩,棉产1082000担。^④所产鸡脚棉,为近代江苏最优良的棉花。^⑤这些土地的产权皆归盐垦公司,每亩土地“顶首”1—3元,“佃户缴纳顶首以后,即可享受承租之永佃权,佃户且可以把耕种权自由出让买卖,不受公司之拘束”。^⑥他们无任何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起着革命的作用,包括“最陈旧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运用所代替了”。^⑦张謇实际上承担了一件农业革命的工作。因此,学者高度评价这一使佃农“跨越一个历史时代”的资本主义公司制。^⑧

第二,土地收入与工业利润相结合,极有利于工农两业的平稳发展。费孝通指出:“由于市镇也是土地所有者聚集的地方,当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中心时,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利用他们从土地中积累的资本从事商业用

① 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11页。

② 叶元鼎:《各省植棉情形调查记》,《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1卷第2期(1920年1月),第233页。

③ 顾毓章编著:《江苏盐垦实况》,张謇研究中心,2003年,第27页。

④ 胡焕庸:《两淮盐垦水利实录》,中央大学,1934年,第259页。

⑤ 江苏实业厅第三科:《江苏省纺织业状况》外编,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3页。

⑥ 胡焕庸:《两淮盐垦水利实录》,中央大学,1934年,第25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1页。

⑧ 陈争平:《张謇所创通海垦牧模式再认识》,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主编《张謇与近代中国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7—214页。

途。”^①在工业繁荣盈利时,利用其利润投资土地;而在工业企业资金短缺时,再把土地利润转向工业企业。无锡荣氏振新纱厂初创时,荣氏族长把义庄的富余资金投入该企业成为创办资本,靠企业利润来维护荣氏义庄。^②在振新纱厂发生经济危机时,荣氏族长用义庄基金购买该厂股票;在振新纱厂营业畅旺时,再把其纱厂股票交换为义庄基金,用于振济孤寡。^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地占有者纷纷把土地积累投向工商业,“无锡城中的杨氏、薛氏和严家桥的唐氏固然早已是这样做法,就是荡口的华氏、北乡斗山的吴氏也都投资兴办近代工业”。^④1949年苏州席氏义庄共收入350石米,经纳税和支付工资、义米、义学等,剩余152石米,同样用于购买工厂股票,以便将来出卖后维持义庄。^⑤

就经营举措与投资策略而言,工业资本家兼营土地,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储备,更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亚当·斯密指出:资本家投资土地,“与商人资本比较,他的财产不易遭遇意外”。^⑥马克思指出,“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⑦。显然,土地经营可以成为工商企业的资金蓄水池,更有助于工业企业抗拒风险。

第三,土地作为抵押品可使工商企业获得大量的贷款。土地证券是金融业乐于收押的抵品,因其易于存贮,更无损耗腐烂等风险。而企业经营者用田单作押,既不会减少其土地收入,更不会像抵押机器原料那样,影响企业经营。章乃器写道:“道契的地位,几乎和别国金融市场时第一流票据或者证券差不多,成为上海金融市场上数量最大而流通最易的信用工具。”^⑧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无锡、苏州、常州等地区一般田契的信用尽管没有道契那么卓著,但至少属于最可靠的信用工具之一。受

① Hsiao-Tung Fei, *China's Gent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103.

② 荣敬本等:《梁溪荣氏家族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③ 荣敬本等:《梁溪荣氏家族史》,第54页。

④ 王康唐、汤可可:《无锡近代经济史》,学苑出版社,1993年,第211页。

⑤ 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576页。

⑥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2页。

⑧ 章乃器:《上海地产之今昔》,《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第6期,1935年6月发行,第13页。

1929年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无锡丝厂普遍资金短缺,但薛寿萱以薛家田单等向银钱业押款,营业独旺,一举确立了中国丝业大王的地位。^①1934年,国民政府在无锡等地力推地价申报,预期的最大益处就是为了增加工商业的抵押资本:“业主凭合法手续取得政府之地价申报证明书,上载有业主姓名、亩数、地价等,有志经营工商业者,即可持此证,向人抵押借款,不啻一种有价证券,市面金融赖以流通。”^②抗战前,中国最大纺织资本集团申新公司,仅1933—1934年荣家即以550余亩地产向银钱业押款百万余元作为工业资本。^③

保留土地经营,以土地作抵押贷借资本,与卖掉土地投资工业企业具有相同的意义。马克思引用吉尔巴特的话指出:“以商品作担保而贷给资本,和以汇票贴现形式贷给资本所起的作用相同。如果某人用他的商品作担保借进100镑,那和他把这宗商品出售而取得100镑汇票,并把这张汇票在银行家那里贴现是一样的。”^④

工商资本家经营土地的现象,绝非近代江苏、乃至中国仅有。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英国,直到19世纪后期,一些资本家同样不惜重金购买土地,成为典型的资本家兼地主。被封为欧文斯通男爵的大资本家塞缪尔·劳埃德,曾花费170万英镑购买土地,至1883年有土地54000英亩。^⑤1924年,伦敦土地所有权调查表明,有地主成了资本家,“而一些资本家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⑥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或城市的金钱(来自贵族和资产者)很早便开始进入乡村生活。欧洲没有一个城市的金钱不向邻近的土地漫溢。”^⑦

① 无锡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永泰丝厂史料片断》,《无锡文史资料》第2辑,第67页。

② 阮荫槐:《无锡土地整理》(二),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等,1977年,第17905页。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抄件:《〈申新〉总公司抵押借款及抵押品表》,该表据申新总公司档案,总公司流水第1号,1933—1934年有关欠款底稿改写。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57页。

⑤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6页。

⑥ [苏]米列伊科夫斯基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经济与政治》,叶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98页。

⑦ [法]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256页。

列宁写道,俄国农村资产者普遍把工商企业同较大规模的土地经营结合在一起,^①他们不但不是什么封建性的表现,而且“只有这少数的殷实户才能稳定地参加‘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②可见,资本家对土地的兼营,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天生具有封建性或软弱性的表现。

最值得注意的是,与资本家阶级相似,近代江南地区相当一部分产业工人占有土地。

工人家庭用工资购置田地的现象极为普遍。1919年,《新青年》刊登学者对上海附近乡村的调查:

在近乡一个工人家里。……那少年和中年的男女,大概也有四五十口,却都在厂里头做工,赚来的工钱,除去了家常费用外,很有些积蓄。他的母亲,指了指屋外的五六亩田地,和我说:“这都是我们几年做工省吃省用省下来的。”^③

据1929年对上海农村50户工人家庭的调查,地租总收入为297元,^④相当于出租土地74.25亩。

近代上海五金业中,厂主往往兼有资本家、工人甚至地主的多重身份。上海工厂中管理引擎的技工,都习称为老轨(即工头)。^⑤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他们“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⑥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个工头可兼任几家甚至十几家丝厂的老轨。钧昌机器厂刘咸德、鸿昌机器厂的张鸿生、申昌机器厂的陆顺泉、裕昶生机器厂的吴根生,是著名的丝厂四大老轨。四大老轨设立的机器厂,“几乎垄断了整个缫丝业的机器制造和修配业务。”老轨在丝厂中参加投资的,更不胜枚举,有些丝厂中途搁浅,由老轨经营的亦不乏其例,“老轨的地位,已不是单纯的缫丝厂雇员,相反,它影响着缫丝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第120页。

③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10页。

④ H. D. Lamson,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 ix, October 1931, no. 4, p. 1071.

⑤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32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6页。

厂的生产。”^①

据其子叙述,吴根生担任通益、天昌、同丰永、云成新旧两厂等 19 丝厂的老轨,“有些丝厂的资本不够,即我父垫款;有时垫款收不回,即作为投资;甚至将整个厂盘进,重新出租,收取租金。”钩昌机器厂厂主刘咸德,为永昌机器厂工头,担任纶华丝厂老轨,并拥有同益丝厂 1 所,是典型的资本家兼工人。刘在“乡间有不少地产,都是从钩昌厂利润中积累起来的。”^②在中国近代最大的民族资本荣家企业中,占地 2—6 亩的工人,占抽样总数的 35.7%;占地数亩至十余亩的工人,占抽样总数的 57.1%。^③ 松江县新农乡四个村 17 户工人和小商人占有田底 103.452 余亩。^④

马克思晚年注意到了各个阶级之间的模糊性。他指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⑤

工人占有并出租土地,同样与封建性无关。列宁把“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视作新型的农村居民,强调“最典型的俄国农村无产阶级是有份地的雇农、日工、小工、建筑工人或其他工人。”^⑥工人占有土地,为资本主义常态。列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这种有份地的农村工人。……每一种农村工人都带有特殊的土地制度痕迹,即特殊的土地关系历史的痕迹,然而这并不妨碍经济学家把他们概括为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类型。”^⑦因此,江南占有土地的产业工人,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

江南土地出租者多兼资本家、商人、职员和工人的身份,土地出租者与租佃者的关系不存在人身强制,但这并不表明“江南无封建”。相反,江南的

①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 326—327 页。

②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 324—325 页。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年,第 119—122 页。

④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4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000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150 页。

⑦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151 页。

资本主义工厂中,还大量存在着人身强制和人身依附。

近代上海工人参加封建帮会的现象非常普遍。李立三指出:“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写道,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近代上海工人加入帮会的最多。^①中共地下党员在抗战前调查,上海煤气业中,工人主要有关帝会、宁波帮、江北帮、无锡帮等;英商公共电车业中,帮派势力较大的为苏北帮和宁波帮。^②法商水电业中,职员主要拜杜月笙等人为老头子;邮电部门有“十二弟兄”,后扩大为“三十六弟兄”,再扩大到一百个。福新粉厂,湖北帮与无锡帮势力最大,湖北帮几乎全部加入洪帮,无锡人多加入青帮。阜丰粉厂工人亦多加入青帮。新关码头工人中,有青口帮、太古帮、天津帮。工部局工人大致分为本地帮、山东帮、江北帮、安徽帮,普遍拜老头子、拜把弟兄。上海人力车夫拜老头子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90%;棉纺工人中,“男工十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③上海造船厂,工人必须加入帮会,“否则必受排挤,甚至工钱之多少,亦受各帮之规定。”^④码头工人则几乎百分之百加入了帮会,上海所有码头都被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范回春的门徒控制着。^⑤

马克思认为,在真正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⑥江南工人加入帮会的普遍性,反映了近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说明工人与厂主、工人与工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这才是真正的封建残余之所在。在这里,工人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要远远强于以法律表现的契约关系,工人出卖劳动力并不完全符合商品交换规律,他们的劳动、自由、甚至生命都被别人所支

① 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74—175页。

②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8、265页。

③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497、625、666、697、677页。

④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⑤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